

回

憶

南

高

東

大

陳啓天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我十三歲，在啓蒙六年以後，考入湖北高等農務學堂附設高小，自黃陂故鄉到武昌就讀，是爲我接受現代新教育之始，十七歲升入該校附屬中等農科，因參加辛亥革命，投筆從戎，隨軍由鄂入贛，民國元年（一九一二）退伍回鄉，秋間入武昌中華大學政治經濟別科，民國四年畢業，歸鄉潛修，五年赴漢口私立民新學校任教，六年秋應文華大學之聘，授中學部國文、法制經濟及專門部憲法等課。民國九年，我曾利用暑假期間，赴南京入暑假學校，並且考取了高等師範教育專修科。九年秋赴長沙就職第一師範，但祇教了一學期，即因長沙各省中爲經費問題罷課，第一師範亦被牽及，復課無期，我乃自長沙返回家中。

憶南高東大

我由長沙回到黃陂家中以後，立即函詢南高教務主任兼教育專修科主任陶知行先生，可否准我再入學。陶先生回信說：「可以破例照准」。於是我於民國十年春初赴南京入甲子級，再當一次大學生。照高等師範的一般規定，係以培養中

等學校教師爲目的。我既曾在大學畢業，又曾在小學、中學以及大學教了四年半的書，現在又來入高師，自然容易引起師友的注意。加之甲子級應於民國九年秋季入學，而我一個人遲了半年才入學，更容易引起師友的注意。當時高師校長爲郭秉文先生，副校長爲劉伯明先生。教育科教授，除主任陶知行先生外，有陸志韋、廖世承、徐則陵、鄭曉滄、孟憲承諸先生，皆曾留學美國，學有專長。甲子級同班有吳俊升、凌純聲、倪亮、姜子榮、韓明夷、徐益棠、邵鶴亭、古樸、侯曜等二十餘人，皆來自各省，有志向學之士。

民國五年，我國分區創辦國立高師五所，南高即爲其一。其餘四所，設於北京、武昌、成都及廣東。當時，除北京外，很少國立大學。因此各地的高師，遂成爲各區的國立高等學府，後來多逐漸擴充並改爲國立大學。南高於民國十二年改爲東南大學，後來又改爲中央大學。南高設於南京北極閣下，明代大學及清末兩江師範舊址。南京地方在民國十五年前比較清靜，而城北尤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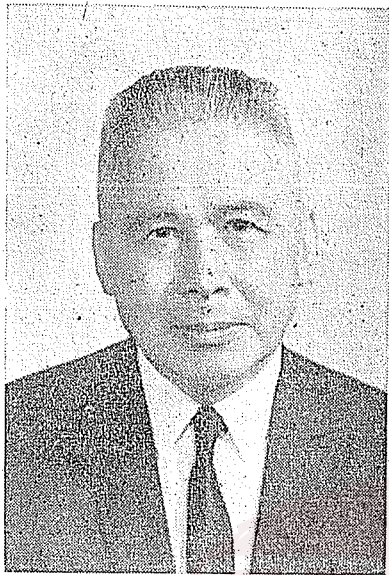
清靜，適於研究學問。名勝古蹟，如北極閣、台城、玄武湖等地，離南高甚近，可供課餘遊息，又如鼓樓、清涼山、莫愁湖、雨花台、明故宮、紫金山等地，亦可供星期日遊覽，均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南高時期的學風有兩大精神，一是誠樸，二是闊大。生活非常簡單，絕少奢靡的習氣，這是誠樸精神在生活方面的表現。師友相接以誠，絕少虛偽的習氣，這是誠樸精神在社交方面的表現。研究實事求是，絕少浮誇的習氣，這是誠樸精神在學術方面的表現。因此誠樸兩字，不但是南高的校訓，而且可說是南高的寫真。這點精神，雖是繼承中國固有學術的傳統精神，同時也可與西洋的科學精神極其接近。所以南高既重視國學，又重視科學，而另外產生一種闊大精神出來。南高闊大精神之表現，在學術上不囿於一系說，在政治上不囿於一黨，在人事上不囿於一系，在地理上不囿於一隅，而具有含攝一切的人文主義傾向。郭秉文先生之辦學，與劉伯明陶知行諸先生之講學，都多少具有這種闊大精神。所以

能一時蔚為風氣，成了一個名實相符的最高學府。當南高鼎盛的時期，也是新文化運動正盛的時期。不過南高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反應，係採取批評態度，不是完全贊同，也不是完全反對。南高教授吳梅、梅光迪、柳翼謀諸先生所辦的學術雜誌雖對於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有所批評，却不是頑固的守舊。

南高仿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辦法，於民國七年秋首創教育科，專攻教育。這在中國，也是首創。教育科的指導原則，大體是依據美國杜威教育哲學、民主主義的教育原理及教育實驗方法。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北大教授胡適之先生廣泛的介紹杜威學說，而南高教育科則首先應用杜威學說於教育研究。因此南高師生對於新教育理論與方法的研究以及新教育運動的推進，都有所貢獻。如果說民國十年前後的北大是以新文

化運動的倡導著名，而同時的南高則以新教育運動的倡導著名。這兩種運動的範圍雖大小不同，然其旨趣則極相接近。所以又可說新教育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不過新教育運動雖帶有美國色彩，却不輕視中國文化，更不反對愛國，自然比較新文化運動的流弊稍少。

南高教育科的功課，多用英文原本。我入學比同班遲半年，自然閱讀較他人困難得多。幸而這個時期，南高已由學年制改為學分制，可以稍稍減少一點困難。而我初入學時，又加倍努力補習各門功課。經過夜以繼日的半年勤讀，始將入學前半年的功課補完。我雖因此漸患腦痛與咯血的毛病，也仍舊繼續勤讀不懈，以免不能完成專攻教育的志願。民國十二年夏，我修完南高畢業的必要學分。民國十三年夏，又補足東南大學畢業的必要學分。因我從前在中華大學所學的普通功課，也可移來算一部分學分。所以我在東大畢業，比較南高同班稍早。與我同時畢業於東大的南高同學，只有歐陽壽、邵爽秋、王克仁三人。從時間上說，我們四人算是東大第一屆畢業生。我在南高及東大先後選習的功課，有英文、生物學、遺傳學、西洋哲學史、西洋教育史、西洋科學史、論理學、社會學、教育哲學、教育原理、中等教育、小學教育、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實驗心理學、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心理學史、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驗、心理測驗、體育、音樂、教育實驗及參觀等科目，而沒有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教育史兩門必修科目，不能



本文作者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陳啓天先生八十近影

不說是一個缺點。在西洋專攻教育學，必須研究西洋哲學史與西洋教育史。而在中國專攻教育學，則必須加修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教育史。從中國哲學史中，可以了解中國歷代儒家對於教育的理想與意見。從中國教育史中，可以了解中國歷代教育制度與學風的演變。我在未入南高以前，曾經涉獵過關於中國哲學史的書籍不少，尚不大感覺設科必修的必要。但關於中國教育史的專書，在民國十三年前的出版界還沒有。當時我為彌補此缺點，曾經立志編輯一部中國教育史。不過我在南高時期，只寫了一篇中國新教育思潮小史；後來也只寫成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一書，而未能完成整個的中國教育史。好在現在已有中國教育史的專書出版，不必再要我編了。

我在南高東大，除選習功課外，並從事寫作與翻譯。當時我寫的文字，多在中華教育界雜誌發表，並有一、二本小書在中華書局出版。我此時的文字，尚不十分成熟。不過從他人看來，多把我當做一個特殊學生看待。我藉寫文字，一面促進研究的興趣，一面補助個人的用費，可以說是半工半讀。南高的學膳宿，雖都是公費，但我個人的開支，每月還需五十至一百元。我為減輕父兄的負擔起見，即以稿費收入作我個人的必要開支。當時一個公費學生，還要每月用掉五十至一百元，似乎太多。不過我係用在購書社交和零用方面，而非用在服飾與娛樂方面，並無浪費的意味。我在南京三年半，始終穿的是布衣布鞋，並未穿過西裝，絕少看電影，聽清唱。社交也多為男友而少女友。南高實行男女同學，自然與我

往還的朋友，男女都有。不過我的服飾既不漂亮，又常公開宣言我已結婚，並已有兩個孩子，自然不易引起問題。大學男女同學制度實行以前，許多人担心青年學生容易發生戀愛糾紛。但是南高實行男女同學的結果，並未發生什麼了不起的戀愛糾紛。男女同學可以增多男女戀愛的機會雖是一個事實，却不能說是壞。我有一個男同班吳俊升與一個女同班倪亮於畢業後成爲一個美滿的家庭，至今爲同學所稱道，即可做一個證明。

我在南高時期，雖以專心研究爲主旨，但仍不能完全避免課外活動、學生運動以及校外朋友的往還。關於課外活動，我曾參加教育科甲子級會、教育科研究會、學生自治會、及鄂籍學友會等。甲子級會是同班同學增進友誼，砥礪德行，並處理級務的一種組織。我承同班的厚愛，被推爲會長，連任三年，始終彼此都很相得，沒有惡感。因此我領悟同學的友情非常純誠，實不下於兄弟。教育科研究會，我只做了一個會員，參加開會，並偶爾爲教育季刊寫稿，沒有什麼大貢獻可說。學生自治會，我曾任一次審判院審判長。南高學生自治會仿照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辦法，分爲執行部、評議部及審判院。民國十三年上季執行部主任方應堯同學檢舉伙食團管理人端木同學有侵佔公款嫌疑，控告到審判院。審判院受理後，由審判長會同審判員在大會堂公開審問，結果合議決定判處端木同學加倍繳還虧欠公款，並請學校令其停學一年。判詞公佈以後，即照着執行。此案初被揭發時，頗爲全體同學所注意。當公開審問時，大會堂觀審者擁擠不堪，皆知其

證據確鑿。審判院同人合議判決時，以我主張嚴辦，獲得多數同意，遂擬定判詞如上。不料端木同學停學以後，即漸次抑鬱成病而死。事後想來，學生自治會代替了學校當局，並代替了法院，未免權力過大。後來端木病死，我心裏也有些難過。不過要送交法院辦理，也許要處罪，比我們的判決還嚴。

南高鄂籍學友會，係由我發起，並由我經理會務兩三年。我之所以熱心此同鄉學友會，一因湖北中學畢業生素來多在武昌或往北京升學，而少來南京就學。我想藉此會聯絡並招待湖北學生來寧投考，使其多一升學的路徑。二因我認爲湖北人的性格各有長短，宜藉此會互相來輔，以求改進。我抱此兩種想法辦理會務，雖然費時用錢也不吝惜。結果，湖北來寧升學的青年，一年多一年。而其成就與眼界，也許比始終未出省求學的青年稍好。

關於學生運動，我曾被人臨時拉差，參加過三次。一次是反宗教運動大同盟，一次是民權運動大同盟，又一次是列寧逝世追悼大會。這三次運動，都是全國性的，而且都是由共產黨暗中發動，而利用他人來出頭主持。當時共產黨秘密成立不久，不易事前發覺他們的陰謀，致我一再被他們利用了，直到第三次才發覺。南京學生界的大運動，照例以南高學生會爲領導，而南高學生會則臨時推一同學來主持。平時我雖不問學生運動，但此三次大運動均被同學強拉爲主持人，再三推辭不得。反宗教運動大同盟，是民國十一年下季舉行的，主要目的在反對基督教。先在南高

大會堂舉行一次學生大會，由我說明反宗教運動的旨趣，曾經引起基督教徒的反對。會後遊行南京全城而散。當時我確反對宗教，尤其反對基督教，所以被人利用參加了這一次學生運動。不過數年以後，我漸漸了悟宗教是人生安定心靈的一種必要法寶。信教既應任人自由，則宗教亦應任其自由流行，不可籠統反對一切宗教，更不可特別反對基督教。

當反宗教運動大同盟開會前，我被推爲大會主席及遊行總指揮，我以患瘧疾尚未全癒，力辭不得，只好勉強主持大會，並隨衆遊行全城。不料病情因之加劇，轉爲傷寒，乃就醫於江蘇省立第一醫院。有一天晚上起來大解，忽然暈倒在床前，肛門出血不止，經醫生診斷，宣告無救。友人曹漱逸等再三懇求醫生設法急救，乃允注射鹽水針兩小時。然醫生仍以我出血不止，脈搏甚微，囑友人替我準備後事。有友人數人，以我病危在旦夕，終夜在醫院看守。幸到翌晨，出血漸少，而我亦能勉強講話。從此仰臥醫院三月，不能起身。每日由吳毅宜醫生診治與親友照料，始得漸次好轉。最後又由表兄李子靈扶歸家鄉調養二月，始可行動。此次在寧患病幾死，全賴友人扶持始能復活。最可感念者，爲鄉友李銘新兄見我病重，不怕傳染，住入醫院照料兩月。其他尚有時來時去的探病友人十餘人亦均可感念。因此感念，使我對人生的意義有進一步的領悟。曾在年紀初稿記之如下：

自經此次大病，予之思想爲之大變。人生最難看破者，爲生死念頭。然予於此次病



庵梅，下松朝六高南在，會年會學國中年少席出天啓陳者作文本，年十國民一第右列四第）天啓陳除，友校期早高南位六有共中其，影合好友與，前之）春效楊為人一前最，（部地史文）真阮為人二第列一第起右列直，外（人第起右，秋爽邵之部學育教為者鏡眼戴，服西黑穿，中列二第。（部學育教人一第列四第起右。仁克王係後之昌錫蔣，昌錫蔣之部學育教為者前最列三。生舜左為人一第左，怡沈為人一末列六第，美東方為。

劇時，曾親嘗生死味道，不過爾爾。因深覺生不必戀，死亦不必懼，然後乃一切無畏，既可善其生，亦可善其死也。常以無生之懷，處有生之事，則掛礙自少矣。予嘗三病幾死：第一次大病在家鄉，以得家人之力而生；第二次大病在旅途，以得路人之力而生；第三次在南京，以得友人之力而生。予三度由死得生，既俱緣於家庭與社會國家，則予之所以生者，當為家庭與社會國家明矣。因人而生，為人而死。因國而生，為國而死。人生意義，其在斯乎！此予今後為人作事所持態度之由來也。

列寧逝世追悼大會是在民國十三年上季舉行，先由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組織籌備委員會，而以南高學生會代表任召集人。正籌備開會中，忽遭地方當局及學校當局禁止開會。參加籌備會的左傾分子再三逼我如期召集大會。我之參加籌備，本係由於被拉。今見環境如此，堅持不必開會。而左傾分子即羣起攻擊我不已。因此我發覺左傾分子中有共產黨專門利用他人為他們作工具。如不肯供其利用，便要受他們的無情打擊。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我便走上堅決反共之路了。

我在南高時期往還較多的朋友，除同學外還有少年中國學會會友。少年中國學會成立的一個青年文化團體。經過民國十年以後會內共產與反共產幾度辯爭之後，始漸次發生分化，並影響今後中國的政局。關於此事，我擬在「政治生涯的回憶」一篇再詳說。現在只略提我在南高時期

與少中會友的私交往還。我於民國八年由王光祈在武昌介紹入少中。民國十年我到南京以後，發覺少中會友多純潔可愛，有志上進。因與常相往還，使我得到精神上的鼓勵不少。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即少中給我們尙友天下之士的機會，使我們的知交，不僅限於同鄉與同學。至於我後來參加中國青年黨活動，除時勢關係外，也與少中有關係。民國十二年下季，我撰就「何謂新國家主義」一文，是受南京少中會友的囑託。從此我在主張上與共產黨處於對立的地位了。民國十三年下季列名發起創辦獅週報的人，多是少中會友，我也是其中之一。於是在行動上又與共產黨處於對立的地位了。這些事情，也留在另篇詳說。

我入南高的初意，是想專攻教育，研究學術。不料還未畢業，即因種種關係，漸次由教育轉入政治。東大畢業以後，雖未與教育生涯完全絕緣，但活動的重心在政治與文字兩方面。所以民國十三年七月以後與教育生涯有關的事情，也宜夾敘在文字生涯與政治生涯兩篇中，不必在本篇複說。

最後還可一談南高東大對於當時政治的一般態度。原來南高校長以及教授均以專心辦學講學為主旨，而不問實際政治。學生也以求學為主旨，而不問實際政治。不過自南高改為東大後，適逢國民黨改組，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名義到處活動，於是南高東大也有極少數同學秘密參加共產黨，如謝遠定夏開權等。這般共產分子利用左傾教授楊杏佛與學校當局為難，造成民國十四年校長

問題風潮，使郭校長秉文與陶知行先生等不得不相率去職。他們加於郭校長等的重要罪名，是東大為國家主義派大本營，反對黨化教育。當時郭陶諸先生雖不贊成黨化教育，但並非國家主義派。東大雖有少數師友傾向國家主義，但談不上什麼大本營。我雖在東大時期已經提出國家主義的主張，但我與郭陶諸先生的意見並不完全相同。然而他們竟用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打擊郭陶諸先生，並打擊東大，而獲得成功。不過東大從此失掉了一個好校長與許多好教授，不能不說是東大的一個大損失。假如郭校長不因此次風潮去職，而能繼續主持東大以至中央大學，我相信東大中

大在教育與學術上的貢獻必更大。至於陶知行先生，原是一個熱心教育不問政治的人物。他在南高東大時期對於新教育運動與平民教育運動的貢獻，無人能予以否認。他離開東大以後，致力鄉村教育，提倡「手腦並用」與「教學做合一」，亦無人能否認其價值。他晚年情緒憤激，致被人疑心他為共產黨，而抑鬱以死。其實他始終不是共產黨。晚年跟他做事的人，固有共產黨分子，但同時也有反共的青年黨員，如楊效春。他想到鄉村教育使各黨派跟他走，而他却不願跟任何一黨派走。這是他晚年的真情，我應代他一為辯白，並說明我永遠懷念他。

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

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
汪公紀等著

中外人物，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執筆名家，陣容之堅強，極一時之選，既富史料價值，又饒有閱讀興味，篇篇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佳構。頃應各地讀者要求，選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已出版，定價十八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

「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要目：

汪公紀：憶吳鐵老。起飛聲中憶尹仲容。
張振玉：十三經譯人理雅格。
王康：蔣百里自戕浴愛河。
朱家驥：于峻吉辦逆勢外交。
楊却俗：白崇禧的毀譽。
易恕孜：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

蔣君章：丁文江二三事。
張森：吳佩孚的患難之交。
王成聖：班禪九世一生神跡。廣東宿將黃慕松。中國哲人郭秉文。
王培堯：將軍與詩人。